

全球向右背景下的公共社會學

——布洛維的理論啟迪

許怡

公共社會學 (public sociology) 是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也是他在勞工研究之外留給社會學最獨特的遺產。公共社會學強調社會學者應超越學術象牙塔，就重要公共議題與公眾展開對話，提供反思性知識並促進公共辯論，甚至直接參與推動社會改革之行動。布洛維關於公共社會學的論著主要發表於2001至2022年，各類論文、演講稿合計近百篇。這二十年間，布洛維亦奔波於美國及世界各地的社會學會議，發表演講介紹公共社會學的思想，不遺餘力地推動公共社會學在全球的發展。本文將對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理論進行一個簡要的回顧，同時以勞工研究為例，梳理受此理論啟發的中國學者和實踐者在過去十餘年如何開展公共社會學干預。

一 公共社會學的當代背景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布洛維借助波蘭尼 (Karl Polanyi) 的框架將市場化進程概括為三波浪潮，這構成了其倡議公共社會學的重要歷史背景。第一波市場化浪潮始於十九世紀，標誌着勞動力的全面商品化；第二波市場化浪潮興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貨幣與金融體系的商品化推動了市場邏輯的深化；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始於二十世紀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使商品化的範圍擴大至土地、水資源、礦產乃至整個自然界，標誌着市場機制滲透至社會生活更廣泛的領域^①。然而，第三波市場化並非一個平滑、線性的右轉過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秩序進入高度動盪與重組階段。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架構在危機中暴露出結構性脆弱，國家權力重新回歸，保護主義、去全球化與產業政策復興並行出現。這種轉型並非簡單的市場化深化，而是在市場邏輯、國家干預與民族主義政治之間形成新的張

力結構。在此背景下，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於 2016 年當選美國總統，成為這一政治轉向的重要象徵。

布洛維在 2021 年發表的文章〈在特朗普時代重申波蘭尼：邁向公共社會學〉(“Going Public with Polanyi in the Era of Trump”) 中指出，特朗普的崛起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全球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一部分；與其同時期或相近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還包括俄羅斯的普京 (Vladimir Putin)、英國的約翰遜 (Boris Johnson)、巴西的博索納羅 (Jair Bolsonaro)、印度的莫迪 (Narendra Modi)、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等。對此，布洛維表達了他的擔憂：儘管這些右翼領導人的威權主義傾向各不相同，但他們治理國家的共同特徵包括對媒體的控制、對自由表達的壓制以及煽動排外主義。在布洛維看來，這些右翼領導人之所以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中誕生，代表了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形成了一種「妥協式平衡」。這種變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由民主作為再分配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威脅着傳統公共社會學(下詳)的生存空間^②。

布洛維的另一個擔憂來自於商品化的深化和擴大。勞動力商品化的深化導致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形成；貨幣商品化的深化和擴大導致金融資本的發展；自然商品化的擴大導致迫在眉睫的生態災難^③。除此以外，還出現了知識商品化的深化與擴大：大學變得日益市場化，研究不再僅僅為了科學的發展或公共的利益，而是服務於資本和國家利益，知識作為公共物品的角色被削弱。另外，隨着數字技術的發展，資本可以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攫取數據，以此擴展商品化的邊界。個人數據被轉化為資本牟取剩餘價值的原材料。這些變化都在推動資本主義進入監控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儘管布洛維主要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社會脈絡下提出公共社會學，但是三波市場化浪潮在中國也有同樣的體現。一方面，西方國家經歷的三波市場化浪潮在中國是以時空高度壓縮的方式呈現——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市場轉型，勞動力、貨幣和土地商品化同時發生，三波市場化浪潮共同席捲而來，極大地擠壓了「社會」的空間^④。另一方面，在第三波市場化浪潮之下，中國在科技領域加速發展，尤其體現在近年來興起的數字技術、人工智能 (AI) 技術等領域。當數字技術與商品化相結合，我們看到萬事萬物皆可商品化。首先是商品化的垂直深化，如今個體作為消費者已被數字技術進行了全面、垂直的數據挖掘，從頭到腳、從軀體到心靈都可以通過數據加以呈現，如毛囊、皮膚、五官、體質指數 (BMI)、心率、情緒，等等。基於這些數據，個體消費者再被推送大量用來匹配這些數據的商品和服務，如植髮、醫美、減肥、身心靈調節等。可以說，個體連毛孔都已被轉化為數據並被資本加以開發和利用。其次是商品化的邊界持續擴大，常見現象如土地和房地產商品化，造就了一波又一波的「樓市神話」。一些過去我們想像不到的自然資源也經歷了大規模的商品化，例如對自然景觀的旅遊開發，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美麗風光被人為地圍蔽起來，以景觀維護之名

加以收費。再如，為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和保障原料供應，中國企業布局海外礦產產地——在非洲開採鋰礦、在印尼開採鎳礦等。這些礦產資源的商品化既給當地帶來了生態危機，影響當地居民生計，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勞工權益問題。

總體而言，上述變化導致很多現實的後果，知識商品化造就了大學的優績主義，學者和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被大大壓縮，給公共社會學的發展帶來致命打擊。同時，數字時代的到來導致個體的原子化，個體沉浸在虛擬世界之中，缺乏與真實世界的連接——這意味着年輕一代已難以發展出共情他人的能力。若不能共情他人的苦難，何談參與公共實踐？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更需要重提公共社會學，從中吸取力量和智慧。

二 理解公共社會學

對於公共社會學的理解，我們需要將其置於社會學甚至社會科學的廣泛光譜中。布洛維將社會學區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專業社會學 (professional sociology)，其服務於學術內部，以學科範式和研究程序為核心，強調技術方法和學術對話；二是政策社會學 (policy sociology)，其受外部客戶 (如政府、企業) 委託，依賴工具性知識，目的是解決具體問題；三是批判社會學 (critical sociology)，主張反思學科基本假設 (如性別偏見、階級視角)，其角色是審視專業社會學研究的基礎；四是公共社會學，面向公眾對話，推動社會目標與價值觀的公共討論，強調社會學的公共責任。四者構成社會學的有機整體，呈現「對抗性依存」(antagonistic interdependence) 的關係：專業社會學為公共社會學提供知識基礎，公共社會學則推動學科與社會現實的連接；批判社會學揭示專業社會學的局限，而政策社會學依賴前者的理論框架^⑤。

布洛維以美國加州「家庭暴力」這一現象為例，解釋了四種類型的社會學在同一個社會問題上的不同定位及互動。專業社會學研究家庭暴力的類型、發生率和悖論；批判社會學從女權主義視角挑戰傳統家庭研究的粉飾功能，但存在着成果被國家接管收編的情況，例如由這派學者所創立的受虐婦女庇護所就被國家接管了，導致批判行動受到抑制。政策社會學則是通過司法體系去吸納社會學的概念，從而為受害者辯護，但其作用可能具有兩面性：有時律師會濫用社會學的研究作為質疑受害者反抗動機的工具，例如「受虐女性綜合症」(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這一概念，原本用來解釋受虐女性為何不願意自衛和反抗；但一旦女性無法再忍受暴力對待，選擇了反抗甚至殺害丈夫，她們就可能被質疑——既然她們反抗了，是不是意味着她們壓根就沒有受過虐待？律師可能會這樣去為加害者進行辯護。公共社會學所做的是，通過公共對話推動社會將丈夫毆打妻子定義為一種「犯罪性攻擊」，在提高公眾意識的同時，也透過公共傳播的影響力推動政策變革。布洛維介紹了美國

先鋒大學 (Vanguard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倫納德 (Elizabeth Leonard) 的公共社會學實踐：她長期研究因遭受極端家庭暴力而殺死施暴伴侶的女性囚犯，後將研究成果出版成書，並與該校英文系教授杜迪 (Warren Doody) 合作將研究改編為戲劇《無期徒刑》(Life Without Parole, 2003)，揭露司法體系對家暴倖存者的不公；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公共傳播以及支持社會團體等方式向州長施壓，為那些被囚的女性爭取假釋機會^⑥。

社會學在公共領域所能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正是這門學科的公共性和社會性，也是其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特性所在——「它不僅是一門科學，還是一種道德與政治的力量」^⑦。同時，這也是公共社會學所肩負的使命：「如果說經濟學的立場是市場及其擴張，政治科學的立場是國家和維護政治穩定，那麼社會學的立場就是公民社會和保衛社會性。在市場暴政和國家專制的年代，社會學——特別是其公共面向——捍衛着人類的利益。」^⑧

三 公共社會學的實踐路徑及案例

公共社會學有多種形式，反映了與不同類型公眾的對話方式。總體而言，布洛維區分出傳統公共社會學 (traditional public sociology) 和有機公共社會學 (organic public sociology) 兩種實踐路徑。傳統公共社會學通過媒體報刊與公眾對話，將學術語言轉化為公共議題，介入新自由主義的虛假敘事；有機公共社會學通過直接嵌入社會運動和社區組織，在具體場景中與社會群體共同合作來解決實際問題^⑨。簡言之，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以媒介為平台，旨在挑戰虛假敘事並與公眾對話，後者則直接參與社會行動及解決問題。在全球向右的背景下，布洛維呼喚更多有機公共社會學實踐的出現，與那些受第三波商品化浪潮影響的公眾接觸、對話，以此直面商品化這一核心矛盾。布洛維也指出，公共社會學應該超越美國中心主義，進行全球南方和北方國家之間的對話，從而扎根本土並跨越國界。以下是筆者收集整理布洛維在不同文章中列舉的公共社會學的實踐案例，這些案例體現了在南北國家推動公共社會學實踐的共同點和差異。

第一種實踐路徑被布洛維稱為「共情公共社會學」(empathic public sociology)，其代表學者是霍克希爾德 (Arlie R. Hochschild)。雖然霍克希爾德最知名的著作是《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⑩，但她對公共社會學的貢獻也不容忽視。霍克希爾德的這項公共社會學研究於2011至2016年進行，即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前的五年。這五年間，她深入到右翼社群(路易斯安那州的「茶黨」[Tea Party]支持者)，尋找到一個與該社群進行對話的切入點——環境破壞。通過這一問題，她揭示了右翼社群的深層故事：他們為甚麼會反對政府(特指民主黨執政下的政府)干預，以及為甚麼會產生強烈的種族焦慮。霍克希爾德

發現，儘管許多受訪者生活在被工業污染嚴重影響的地區，但他們仍然反對環保法規和政府干預。這一巨大的悖論在於，右翼社群並不認為政府是解決方案，而是問題所在——監管和干預阻礙經濟發展和影響民眾的福祉；而少數族裔和移民則可以通過政府政策享受各種「優待」，從而擠壓白人實現「美國夢」的機會。這種感覺讓他們成為了「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⑪。共情公共社會學的貢獻在於，社會學家發現了通過對話去理解他者的重要性——跨越「同理心之牆」去理解跟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是彌合社會分裂的關鍵^⑫。

第二種實踐路徑被布洛維稱為「肯定性公共社會學」(affirmative public sociology)，代表學者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賴特(Erik O. Wright)。在《展望真實的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一書中，賴特介紹了幾種與左翼社會組織合作推動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如全民基本收入(UBI)、合作社、公共銀行等。在賴特看來，侵蝕資本主義的策略有不同類型，有的是斷裂式的，如階級鬥爭；有的則是共生式或間隙式的，如合作社等替代性方案。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化浪潮的間隙中尋求合作與共生，同樣可以實現公民的賦權並構建起「去商品化」的實踐網絡^⑬。

除了霍克希爾德、賴特之外，布洛維本人也是公共社會學的踐行者。早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他便在贊比亞的礦業公司研究當地的種族分工問題。通過偽裝為礦業公司員工，他得以收集公司的數據並觀察員工的晉升過程。一個重要的研究發現是，哪怕黑人工人實現了晉升，實際權力仍然會由白人管理者掌握，公司通過職銜調整(如虛構新職位)等方式以維持種族之間的等級差異。布洛維研究報告揭露了後殖民國家的階級矛盾本質，他也突破企業的重重阻力公開發表了研究報告，並在報紙和電視上引發公眾辯論——這無疑是一個經典的傳統公共社會學實踐範本。然而，礦業公司利用報告批評政府，將其作為整頓內部管理的藉口，反映了公共社會學成果易被權力集團收編的風險。布洛維也因此意識到傳統公共社會學干預的局限性——單純揭露真相不足以促成社會變革，必須結合政治性的策略^⑭。

類似的實踐案例在布洛維的文章中多次出現。例如，巴西社會學家設計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形成，讓當地民眾可以直接參與決定地方市政資金的分配^⑮；加州社會學者伯納奇(Edna Bonacich)通過研究揭露了洛杉磯服裝產業的勞工剝削問題，並與工會合作支持移民工人的權益運動^⑯。

在中國，本世紀初以來，也湧現出許多堪稱「傳統」或「有機」的公共社會學成果。傳統公共社會學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廉思對「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的研究，暴露了青年群體的生存和發展困境^⑰；劉燕舞對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的研究，揭示了自殺作為社會結構問題(如社會保障不足)的極端表現，從而為社會學干預提供啟發^⑱；潘綏銘等對性工作者的研究則打破主流論述中的道德化或受害者敘事，將性工作去污名化帶入公共討論^⑲。在有機公共社會學方面，不少社會學者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參與重要社會議題的倡議和改變。例如，在新農村建設領域，賀雪峰團隊在湖北洪湖、荊門的四個農村發

起老年人協會，推動農村「互助養老」實踐²⁰；在社會工作領域，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大量社會工作專業師生（如廣州中山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深入災區開展災後社區重建、經濟復興等工作²¹；在公益和志願領域，朱健剛團隊參與觀察並推動了社區組織建設、非政府組織(NGO)能力培育、業主維權等城市公共議題的社會學干預²²。

概括而言，公共社會學的干預並不局限於單一路徑，它既可以是傳統的——以媒介和公眾對話為導向，挑戰新自由主義敘事；也可以是有機的——直接嵌入各種社會行動，與社會群體合作應對商品化的負面後果。更多情況下，傳統與有機的路徑需要相互補充——開展社會行動需要通過挑戰與重構敘事以達成新的共識，而公共傳播則有助於擴大社會行動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公共社會學所面對的受眾不應局限在學術圈，也不能局限在左翼群體，而應該走向那些與我們存在意識形態區隔、經驗區隔、身份區隔的群體，也就是所謂的「他者」。在全球向右的背景下，左右陣營日益分裂，不同種族之間的區隔化與敵對化現象日常性地上演，公共社會學提出的上述思路也許正是化解這些矛盾、彌合社會分裂的關鍵。

四 勞工研究及公共社會學干預

勞工研究本身具有公共性，因為它所追求的目標並不僅是學術知識的生產，而是作為一種解放的工具，通過與勞工群體的對話和開展干預行動，推動其處境的改善²³。布洛維於2008年發表了一篇題為〈公共的轉向：從勞動過程到勞工運動〉（“The Public Turn: From Labor Process to Labor Movement”）的文章，而他本人的學術生涯歷程正是這一「公共轉向」的完美詮釋。如學術界所周知，布洛維早年的學術成果《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變遷》（*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成為了勞動過程理論的里程碑作品²⁴；自1990年代後，他的關注點更多地轉向勞工運動，曾多次撰文討論工會力量的衰落和勞工運動的重構，並指導學生開展關於工人運動相關研究²⁵，這些研究成果後來也成為了他提倡和發展公共社會學的重要素材來源。

在〈公共的轉向〉一文中，布洛維指出，自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1974年出版以來，西方國家勞工研究的主題圍繞勞動過程的控制與抵抗展開。這既是對傳統工業社會學的突破，也是馬克思主義視角下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復興。然而，這樣的研究逐漸面臨局限，因其過於關注結構性剝削而忽視了勞工的能動性²⁶。1990年代後，勞工研究經歷了一個公共的轉向，開始關注「勞工運動」本身。這一轉向與工會策略的轉變直接相關：伴隨傳統的產業工會運動的衰落，「社會運動型

工會主義」興起，勞工運動開始聚焦服務業員工、移民、女性等邊緣工人群體，並採用非傳統的組織策略（如社區動員、揭露品牌公司的血汗工廠等）。勞工運動的轉變也吸引了社會學家的關注，他們不僅研究新勞工運動的組織策略，也轉向了推動勞工權益立法、參與工會行動等更直接的干預方式。公共社會學所強調的學術與實踐的結合，在此後的勞工研究領域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²⁷。

同一時期的中國，工人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處境。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後東南沿海地區出現大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產業工人隊伍主要由農村地區來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群體構成，他們缺乏的是組織化、工會化的團結機制，而非像歐美產業工人那樣面臨去工業化導致的工會運動衰落。另一方面，中國的勞工研究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關注點和理論視角。1990年代的勞工研究以農民工研究為主，但其局限是把勞工群體和勞動問題置於「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社會問題」等社會學理論框架下考察，缺乏「勞工社會學」的理論視野。到了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將勞工社會學確立為主要學科方向之一，並與布洛維一系的學術力量建立合作關係，定期開設勞工社會學課程和舉辦工作坊。自此，國內勞工研究百花齊放，並以「勞動過程」為核心開展了包括生產與勞動體制、勞工意識與文化、勞工組織和抗爭等一系列的研究²⁸。

勞工研究的蓬勃發展也激發勞工研究者走向「公共的勞工社會學」，即開展面向工人群體的社會學干預。例如，在華北地區，清華大學沈原團隊曾進行過「強干預」（開設農民工夜校）和「弱干預」（NGO能力建設）兩類不同的干預途徑嘗試²⁹。在華東地區，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劉建洲團隊則嘗試了一項以培育工人階級意識為目標的社會學干預：給工人開設讀書會和觀影會，通過閱讀韓國工人運動先驅者全泰壹的傳記和播放相關電影，引發工人對自身階級處境和體驗的思考與討論³⁰。

在華南地區，筆者也曾研究或參與過一系列可稱之為「公共的勞工社會學」行動，在此作一簡單梳理。在本世紀初的頭十五年，對華南地區的勞工問題干預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NGO主導的直接面向工人群體的賦權工作，如為他們提供勞動法的宣傳和諮詢，以及文化和意識提升類活動³¹。這類NGO的背後不乏勞工研究者的身影，如為NGO提供智力支持和能力建設，又或者通過與NGO、工人對話，將研究成果公之於眾以引發關注。第二類則由高校師生團隊主導，效仿北美的「反血汗工廠運動」，將矛頭直指歐美跨國品牌公司，如迪士尼（Walt Disney）、可口可樂（Coca-Cola），揭露其中國代工廠剝削勞工的行徑，並通過公共傳播、輿論施壓等方式，倡導品牌公司履行貫穿其供應鏈的企業社會責任³²。

2010年發生的震驚國內外的富士康工人「連環跳」事件將第二類干預模式推向了高潮。事件發生後，兩岸三地多所高校社會學系的師生組成研究團隊，利用暑假在深圳富士康的兩個園區開展了一個月的集中調研，部分師生

後續又進行了多次回訪。調研發現最後彙集成書相繼在香港和內地出版³³，並通過媒體報導獲得更大範圍的傳播。行動的矛頭不僅瞄準富士康，更是針對其主要客戶蘋果公司 (Apple Inc.)。通過國際輿論壓力，研究團隊向蘋果公司施壓，並揭露其即時生產模式 (just-in-time production model) 才是導致富士康工人長期超時加班、承受高強度和高壓力勞動的罪魁禍首。在多方壓力之下，蘋果公司允諾與NGO合作，敦促其供應商改善勞動條件，而富士康也採取了加薪、減少加班時長、規範學生工管理等一系列改進舉措³⁴。

發生在2014年的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集體維權事件則是上述兩類干預模式的整合。該起事件是公共服務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典型勞動者權益受損事件：政府通過招投標方式將環境衛生等公共服務市場化，不同公司之間的交接必然涉及到工人勞動合同的轉換、工齡計算及經濟補償金提供等核心權益問題。由於該事件發生在大學城這一特定區域，參與聲援這場行動的大學生並不局限於社會學專業，而是來自不同的大學和專業，他們通過非正式的方式自發地組織起來聲援環衛工人的抗爭：現場支持、深度訪談、媒體傳播、行為藝術、捐款捐物等。另一方面，勞工NGO也介入其中，協助環衛工人釐清訴求、選舉代表並為集體談判做準備。經過持續一個多月的集體行動和多達五輪的集體談判，原公司終於同意補償工人遣散費及欠繳的社會保險費用和公積金，新中標公司也與全體環衛工人簽訂了新的合同，抗爭行動宣告成功³⁵。

2015年末，華南地區數家勞工NGO的負責人及核心工作人員因「聚眾及擾亂社會秩序」罪名被刑事拘留，部分人員後被判刑。這一事件意味着帶有維權和對抗性質的勞工介入行動被迫中止，十餘家勞工NGO被關停、取締。此後，其餘致力於服務勞工群體的NGO紛紛轉型，從面向工人群體的勞動權益介入轉向了面向工人家庭、子女等再生產領域的社會服務³⁶。這種看似妥協的轉型並非毫無意義，而是為公共社會學干預開闢了新的空間。隨着農民工家庭化遷移 (即農民工的子女甚至父母隨遷到城市) 的特徵日益顯著，如何應對家庭化遷移之後出現的子女升學與照料、城市適應、住房環境問題等，都是該群體面臨的新困境。這些轉型後的社會組織聯同社會學或社會工作專業的高校師生開始在農民工聚居的社區開展各類社群培育、育兒互助、合作經濟等方面的實踐，以期回應上述困境。近年來，在育兒互助方面，廣州曾有兩家服務於農民工家庭的社會工作機構參與基於社區的互助育兒實踐³⁷；在合作經濟領域，則有依靠勞動者技能資源的「生產型合作」實踐 (如北京鴻雁家政工社會企業³⁸、深圳綠色薔薇女工社會企業³⁹)、依靠城市捐贈資源的「消費型合作」實踐 (如北京同心互惠舊衣商店⁴⁰)，以及回應農民工住房困境的「住房合作」實踐 (如廣州某城中村的住房合作社⁴¹)。

總而言之，勞工研究和相應的公共社會學干預都經歷了一系列的轉向。按照布洛維的說法，美國的勞工研究經歷的是從勞動過程到勞工運動的公共的轉向；中國的轉向則受到國家治理模式轉變的影響，從曾經的勞動過程與

勞工運動研究並存，到近十年來重新聚焦勞動過程。但公共社會學並未消失，它以一種更為溫和、實用主義和兼具創造力的方式在一個新的威權制度環境中尋求空隙和共生。

五 公共社會學的實踐困境與挑戰

由上述回顧可見，不管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開展公共社會學的實踐遠比專業社會學或政策社會學來得困難，並且遭到制度性的排斥，尤其是在全球向右的背景下。這些困難和挑戰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來自學科體系的內部張力。一方面，社會學的專業性和公共性之間本就存在衝突，專業性強調客觀中立、工具理性和學術導向，而公共性則關注公平正義，強調價值理性及實踐導向。另一方面，公共社會學的發展受到學術評價體系的制約，不管是國際還是國內的學術評價體系（如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都迫使研究向主流範式和前沿、熱點議題靠攏，很多重要又懸而未決的現實議題被邊緣化。這就導致公共社會學的成果難以突破學界壁壘，現實的發表和晉升困境阻擋了年輕一代的學術力量加入公共社會學陣地。

其次是外部社會環境的惡化。受新自由主義的侵蝕，大學市場化、知識商品化，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資本和市場需求的驅使，大量的研究資金流向技術性項目，擠壓公共議題研究的空間。知識商品化也導致研究成果往往容易被權力集團挪用或收編，又或是淪為權力集團打造合法性敘事的道具。而隨着全球威權政治的崛起，媒體和言論遭遇更嚴格的管制，公共社會學的傳播渠道進一步受阻。另一方面，威權政治和商品化也加劇了公民社會組織（CSO）生存空間的惡化，公民社會的發展遭遇滑鐵盧，一些公共干預行動被迫轉入地下，又或者轉型為較易被官方接受的教育類或社會服務類活動。

最後是實踐過程中的具體困境。公共社會學的實踐面臨着資源分配的失衡與不均等現實難題，這種資源失衡既體現在全球南北國家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北方國家掌握着絕大多數的學術期刊資源），也體現在國家的內部。學科差異導致資源偏差（自然科學往往能獲得十倍或百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資助），以及地區性（城市地區所獲得的資源遠高於農村鄉鎮地區）和議題性（熱門議題的資源獲得易於公共議題）的資源失衡。資源的不足和使用限制導致社會學者在介入公共議題的時候常常面臨資金、場地、人力等諸多現實困難。上述困難也造成了公共社會學干預長效機制的缺失，很多實踐停留於短期的項目（如學生暑假調研或實習），難以形成長期的積累和持續的影響力。除此以外，公共社會學者可能也會面臨「研究者」與「參與者」的角色悖論，如果過度介入可能被指摘學術客觀性不足，若以超然態度旁觀之又容易陷入道德虛無主義。

以上種種困難雖然給公共社會學者帶來了嚴峻挑戰，但布洛維以其洞見指出，這些都不應成為阻擋公共社會學前進的步伐。他一方面提醒我們警惕「盲目的樂觀主義」^⑳，另一方面也鼓勵我們堅守「不妥協的悲觀主義」^㉑，即認識到承認矛盾的不可消除性本身正是公共社會學的生存智慧。在當下的歷史條件下，追求一種「對抗性依存」或許正是公共社會學者能夠保持的清醒自覺和行動準則。

註釋

① Michael Burawoy,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no. 1 (2005): 4-28.

②③④ Michael Burawoy, "Going Public with Polanyi in the Era of Trump", in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ublic Sociology*, ed. Leslie Hossfeld, E. Brooke Kelly, and Cassius Hossfel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11-21; 12-16; 17.

④ 聞翔：〈社會學的公共關懷和道德擔當——評介麥克·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1期，頁224-33。

⑤ Michael Burawoy, "Sociology: Going Public, Going Global" (2015), <http://burawoy.berkeley.edu/PS/Introduction.Going%20Public,%20Going%20Global.pdf>.

⑥ Michael Burawoy, "A Public Sociology for California", *Critical Sociology* 34, no. 3 (2008): 339-48.

⑦⑧ 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著，胡麗娜、聞翔譯：〈保衛公共社會學〉，載布洛維著，沈原等譯：《公共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7：47。

⑨ Michael Burawoy, "For Public Sociology", 4-28; "The Critical Turn to Public Sociology", *Critical Sociology* 31, no. 3 (2005): 313-26; "Why Public Sociolog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Public Sociology*, ed. Lavinia Bifulco and Vando Borghi (Northampton,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3), 19-21.

⑩ Arlie R.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⑪ Arlie R.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2018).

⑬ Erik O.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Books, 2010), 215-64, 308-65.

⑭⑮ Michael Burawoy, "Public Sociology: The Task and the Promise", in *Ten Lessons i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ed. Kenneth A. Gould and Tammy L. Lew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79-98.

⑯ Michael Burawoy, "A Public Sociology for California", 345-46. 由於篇幅限制，此處不作詳細介紹。

⑰ 廉思主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⑱ 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⑲ 潘綏銘等：《小姐：勞動的權利——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北城市的對照考察》(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

⑳ 溫曉薇：〈湖北：「低消費、高福利」養老試驗〉，《小康》，2013年第12期，頁89-91。

㉑ 古學斌、張和清、歐陽令芝：《堅守：從「映秀母親」到「山裏碼頭客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⑳ 朱健剛：《行動的力量——民間志願組織實踐邏輯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㉓㉔ 沈原：〈勞工社會學三十年〉，《社會學評論》，2020年第5期，頁3-17。
- ㉔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㉕ 例如，Gay W.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Ching Kwan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Ruth Milkman, *L.A. Story: Immigrant Workers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 ㉖㉗ Michael Burawoy, "The Public Turn: From Labor Process to Labor Movement", *Work and Occupations* 35, no. 4 (2008): 371-87.
- ㉘ 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頁1-25；〈勞工社會學三十年〉，頁9。
- ㉙ 劉建洲：《農民工的階級形成與階級意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215-60。
- ㉚ Yi Xu, "Lab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Mobiliz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5, no. 2 (2013): 243-59.
- ㉛ 許怡：〈跨境行動主義：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的傳導與策略重塑〉，《開放時代》，2015年第1期，頁192-210。
- ㉜ 潘毅等主編：《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潘毅等編著：《我在富士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 ㉝ Yi Xu, "Activism beyond Borders: The Study of Trans-border Anti-sweatshop Campaigns across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Ph.D. dis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2), 135-46.
- ㉞㉟ Yi Xu and Xuewei Dou, "From Empowerment to Encapsulation: Sanitation Workers' Struggles and Sources of Power in South China", *Labor History* 62, no. 4 (2021): 413-33.
- ㊱ 關於互助育兒實踐，參見許怡、辛榮：〈流動中婦女的母職實踐與主體重塑〉，《社會發展研究》，2021年第4期，頁81-102。目前其中一家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已注銷；另一家機構的「媽媽互助社」後來因學校提供託管業務導致需求下降，服務亦已中止。
- ㊲ 劉佳璇、丁睿：〈在這裏，她們從家政阿姨做回自己〉（2022年5月9日），中工網，www.worker.cn/c/2022-05-09/6888564.shtml。
- ㊳ Ewbar：〈從「她說」到「我想」，深圳女工的麪包與玫瑰〉（2022年2月25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38003。
- ㊴ 彭訓文：〈舊衣服也能成寶貝〉（2022年5月30日），人民網，<http://jx.people.com.cn/BIG5/n2/2022/0530/c186330-35291898.html>。
- ㊵ 許怡、王前：〈合作式賦權：基於一個流動人口社區的住房合作行動研究〉，即將發表於《開放時代》。
- ㊶ Michael Burawoy, "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 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1, no. 2 (2010): 301-13.
- ㊷ Michael Burawoy, "On Uncompromising Pessimism: Response to My Critics", *Global Labour Journal* 2, no. 1 (2011): 73-77.